

雾霾治理需要“四位一体”改革

张茉楠

近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提出要下大力气解决“心肺之患”,彰显了决策层对于“治霾”工作重要性及紧迫性的高度认识。然而,治理雾霾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必须把治理雾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化“顶层设计、综合治理”。

持续的严重雾霾是工业化对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的直观展示,也是对传统工业生产触碰自然底线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发展、城市治理有效性的检验。大面积雾霾带来了经济社会风险和重大损失,而其成因又极其复杂。笔者认为,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必须改变目前环保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污染防治和出口管理、进口管理相结合,强化多种污染控制和全国联防联控相结合,积极探索“四位一体”的雾霾治理新模式。

加快推动“大环保”体制改革

雾霾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在现有的环保体制背景下应对则显得非常被动,必须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形成合力。

一是加快推动环保体制改革,成立“大环保部”。雾霾现象只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缩影,除此之外,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已非常严重,迫切需要建立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为职能的“大环保部”,或设立高级别的环保协调机构,改变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局面,实现全国环境保护垂直管理、区域管理和综合管理,研究制订国家大气治理发展战略,完善生态建设咨询评估机制,并统一发布大气污染评估报告。

二是加快推进环保立法,加强法律和行政监督。当前,要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进一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加大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以及环保部和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

三是健全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和“追溯问责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的政府决策和企业生产经营信息的公开制度。同时,建立“追溯问责”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污染代价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危害无所遁形。

四是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市场化环保手段。当前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与“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导向有关。

要按照“排污者付费、治污者赚钱”的原则,推行“把治污权交给第三方”的管理模式,并可以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师制度等节能服务新机制改善能源管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脱硫、脱硝设施运营基本实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

加快调整重化工业结构 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我国重化工业总体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集聚性。过密的工业布局,使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分配,加重地区环境污染的隐患。要通过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逐步疏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重化工业产能,逐步降低大气污染严重区域的煤炭消费量。建立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重化工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避免产能转移“重化扩散”。

重新谋划能源布局 坚持实施总量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配置方式过度依赖输煤,电力发展以分省(区)自我平衡为主,导致东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考虑中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但能源匮乏,而西部地区煤电、水电、风电资源充沛,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特高压西电东送,另一方面,凡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集中建设坑口电站,加大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的力度,实现输煤输电并举。

坚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促进能

源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在能耗总量分解上,应综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目标等因素,把能耗指标差别化分配给各地区,因地制宜;引入市场机制,建立能源量指标交易置换制度,实现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配额交易;建立健全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真正发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倒逼作用。

倡导低碳发展理念 推动绿色城镇化发展

协同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多种污染减排控制一揽子计划:

一是在生产领域,强化企业排放标准,加快与空气治理相关的低碳技术开发应用,积极使用低污染排放的原材料、能源和工艺流程,开发工业污染的回收利用技术,以及工业污染的疏散工艺流程等。

二是在交通领域,提高汽柴油和市场准入标准,加快推广汽车加装置转化和PM2.5过滤器装置,全面放开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和使用,加快城市和网络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三是在建筑领域,全面强制推广城市建筑垃圾抑制措施和控制标准,对建筑工地扬尘措施不到位的实行一票否决的停建制度。

此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新理念,引领低碳消费方式,让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节能环保产业 将成拉动经济新主角

王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实际上,2014年全国地方“两会”已相继召开,地方“两会”纷纷把节能环保列为关注焦点,雾霾防治、水污染治理、生态红线划定分别是环保三大要务,不少省份和地区拟投入巨资加快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华北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大气治理为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则以水污染防治为主。北京与江苏明确了大气治理市场的投资估算,北京市4年内将投入7600亿元,河北则立下“军令状”治霾,各地相关区域节能环保产业有望获得相应投资机会。由此,笔者认为,节能环保产业将在马年扮演拉动经济的新主角。

多管齐下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首先,从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理念,坚决摒弃那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可能兼顾,我国只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的错误思想,一定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不误,围绕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工程为依托,强化政府引导,完善政策机制,培育规范市场,着力加强技术创新,大力提高技术装备、产品、服务水平,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释放市场潜在需求,形成新的增长点,为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改善环境质量,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意义重大

近年来,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并迅速成长为推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节能环保产业已进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即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阶段,且已进入技术成熟期,产业快速发展,释放市场潜在需求,形成新的增长点,为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改善环境质量,保障改善民生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其次,在发展规划方面,全国各地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要求,积极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加快淘汰各地落后产能,加大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煤炭、造纸、印染、制革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积极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着力削减化学需氧量 and 氨氮排放量;加大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力度,持续推进电力行业污染减排,加快其他行业脱硫脱硝步伐。

再次,在政策措施方面,应从法规体系建设、环境经济政策多方面给予保障,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完善排污收费制度;落实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电价政策,研究制定脱硝电价政策,对污水处理、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非电力行业脱硫脱硝和垃圾处理设施等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在地方考核方面,也将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另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有可为。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布局规划。具体而言,政府要转变职能,做节能环保产业的服务者;合理规划,做节能环保产业的布局者;正确引导,做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唯有如此,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潜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生态中国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命题

晏扬

据报道,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727万。年复一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一届又一届大学毕业生求职浪潮。调查显示,尽管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仍让不少毕业生难以抗拒,但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求职时更加务实,选择回归。2013年,有61%的高校毕业生“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或者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逃离北上广”是近年来屡被提及和热议的话题,“61%高校毕业生逃离北上广”的调查结果,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颇显宏大的时代潮流。至于“逃离”的原因,媒体报道总能归纳出几条,比如北上广的房价太高、户口无法解决、工作压力太大、幸福感太低等等,似乎有理有据、有鼻子有眼,让人不由得相信“逃离”之说。

可是,冷静思之,“逃离北上广”果真成了一种潮流吗?不妨先来分析61%这个数据。姑且认为该数据是客观真实的,但从新闻报道中看,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全国高校毕业生中有61%的人选择在二三线城市工作或在“家门口”就业,换言之,有将近四成的毕业生“难以抗拒”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诱惑。一线城市就那么几个,全国近四成高校毕业生蜂拥到一线城市就业,这个比例还不够高吗?总人数还不够多吗?还能叫“逃离北上广”吗?

退一步说,且不论全国高校毕业生,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高校毕业生,有近四成选择留在一线

城市工作,那也是一个异常庞大的数字,它恰恰见证了一线城市对高校毕业生的巨大吸引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地级以上的城市就有239个,一线城市高校多,毕业生人数多,61%的毕业生回归二三四线城市,这个数字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所谓“逃离北上广”,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嫌,故作惊诧罢了。

实际上,与“逃离北上广”相对应,近年来“逃回北上广”也是一个屡被提及和热议的话题。至于“逃回”的原因,媒体报道同样能归纳出几条,比如“小地方”人际关系复杂、拼爹风气浓厚、收入待遇太低、个人发展空间有限等等,同样是有理有据、有鼻子有眼。那么,高校毕业生究竟在“逃离北上广”还是在“逃回北上广”?究竟哪种选择形成了一股潮流?

依我之见,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或许都是刻意炮制出来的伪命题,或者说都是“盲人摸象”轻率得出的结论。在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代,有人看重一线城市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有人看重二三四线城市轻松惬意的生活;有些向往大都市的繁华,有人迷恋中小城市的安逸;有人“逃离”北上广,有人“逃回”北上广;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不能看到有些人选择离开就以偏概全地认为“逃离北上广”成为趋势,也不能看到有些人重返一线城市就想当然地认为“逃回北上广”成为潮流。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各有优势,谈不上哪一种选择更加务实。

“地沟油”上天 国产一号生物航煤获批



切莫小看地沟油,变废为宝逞风流。航空能源用得上,降低排碳效果优。欧美企业先发力,中国石化争上游。再生能源结硕果,国产科技有拳头。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中国制造”应在“二次创新”中确立新定位

井水明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在日前召开的第12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外贸的政策应该定位于有比较优势的中间产品和工序贸易,而非整个产业链条。这是由全球产业价值链所决定的。中国企业应在“二次创新”中寻求突破。

“中国制造”从名声大振到向转型升级的“中国创造”迈进,从代工起步的企业家们一直致力于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注重品牌、研发和销售的艰难探索,都凸显出中国企业努力向产业高端的终极目标攀登,都在努力寻找产业链的全覆盖,以展示“中国制造”的英雄本色。可是,“中国创造”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没有多少中国企业家能够说得清楚,因此,我们在紧贴全球价值链,紧跟着世界科技第一梯队的过程

中时常找不到北,弄清楚“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应有价值取向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而把“中国创造”定位于中间产品和工序贸易的设想,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前行之路中能够取长补短的真正效率是进行“二次创新”。

中国产业正进入转型升级的历史时期,中国企业正经历着新的产业和产品创新,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是比较薄弱的,无论是科技人才的储备还是科技创造的投入都没有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就非常低下。近年来,中国企业大步“走出去”,到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去寻找合作伙伴,在此过程中,合作共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合作来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制造业的管理与科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学习和借鉴的过程,让中国企业获得并具

备“二次创新”能力。虽说这种“二次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种创新,但是,这种创新本身要原创新来带动经济与便捷,对于科技实力和能力都不是很强的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更加符合中国企业现阶段的实际,也确保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之中少走或者不走弯路。

之所以将中国产业政策定位于中间产品和工序贸易,是因为中间产品占据全球贸易份额的60%。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为20%,但占全球贸易80%比重的货物贸易中,有30%是服务贸易带动的。因此,实际服务贸易要占到全球贸易的半壁江山。可不得不正视的是在中国企业的创新策略上存在着一种误区——就是看中原始创新而忽视了二次创新。以为只有原始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二次创新则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借鉴”,在产品推向市场时会遇到别人的非议。但是,

我们不要回避,当年日本经济能够快速起飞,就是注重了二次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产业格局与规模。这种先例对中国企业具有借鉴作用。

全球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中国企业从中获得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非常有限,这逼得中国企业必须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技术和升级的支持。而要实现这一条,恐怕两条腿走路才是上策——一方面中国企业应当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之中,掌握与学习这些企业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进行二次创新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基础创新能力的修炼。二次创新需要有基础创新作支撑。江苏阳光集团在纺织业转型升级中,通过强大的基础创新能力,在纺织面料的开发上,闯出一条“人无我有”的高效之路,在全球纺织业大萧条的状况之下,依靠基础创新能力的优越,一直走在全球新产品开发的前沿。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 0755-83501640;发电邮至 pp118@126.com。